

# 社会主义特色的思想源起和在中国的早期奠基

孙 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认识,即社会主义是应该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但提出了反对“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思想,主张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要重视特殊性的分析方法。列宁从实践上开始了具有俄国道路意蕴的探索,但并没有确立俄国道路的理论命题,其社会主义理论依然是忽略民族性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首先提出了指导思想的本土化问题,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民族特色道路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展开的理论创新开辟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性;民族性;早期奠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5)05-0465-07

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是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进程相互映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代表了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涉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有,或者应该强调特色?

## 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但提出了反对“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思想

对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涉及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俄国革命的思考和论述,后来也被称为“东方道路”的思想,毫无疑问属于社会主义特色问题的论述。他们的这些论述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及 1882 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著述当中。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考,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奠定了认识社会主义特殊性不可忽略的理论前提。

首先,他们否定了在欧洲资本主义分析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进程推而广之的观点。

1877 年 10~11 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坚决反对将他立足于西欧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上升为一般历史哲学,批评那些以这种方式来捍卫他的理论的人不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并不能从《资本论》附注中他关于赫尔岑的评语来理解他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sup>[1]339</sup>。他还强调指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1]341-342</sup>。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还清楚地、实事求是地谈到俄国这样的国家,其社会主义革命是还没有回答的新命题,说:“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 1882 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2]466</sup>毫无疑问,对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一般历史哲学”的否定,为社会主义特色道路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空间。

其次,提出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要重视特

殊性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先进的欧洲,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欧洲之外世界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他们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在反对简单化地运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一般历史哲学相对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虽没有具体地阐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问题,但提出了研究的方法:“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1]342</sup> 马克思显然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

强调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就是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反对无视差别的、简单化的和“一锅煮”的认识方法,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谈到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sup>[2]458-459</sup>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道路”思想是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始终呈现的一条主线是:围绕以欧洲发达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展开,而非非能够独立或先行推进的。恩格斯很清楚地阐述到:“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走在前列,而且指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与发达国家相呼应。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其思考表述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

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2]460</sup>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涉及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成熟等诸多客观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超越历史,得出的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结论。

## 二、列宁从实践上开始了具有俄国道路意蕴的探索,但并没有确立俄国道路的理论命题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传播的过程中,俄国的革命者就意识到,如果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与欧洲的工业国有较大的区别。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论述并没有超越既有的实践,而是提供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很显然,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还是只能由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自己去探索。

列宁对社会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带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还在于他领导了一个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突破了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发达工业国爆发的基本认识。

应该说,列宁开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有特色的,它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开始,而起步于资本主义比较落后的俄国,无疑是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实践已经证明,列宁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大大促进了俄国-苏联的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特色,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来看,并没有鲜明地凸显出来,也没有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认识,但它实际上已经在实践的层面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应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问题。

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主要的特点应该在哪里?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程度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落后国家要面临资产阶级所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这双重使命。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尤其是通过总结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成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列宁提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命题,反对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者将两者截然分割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等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够

进行的教条主义观点。他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sup>[4]140</sup>,强调了两者是统一的进程,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sup>[4]633</sup>。列宁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阶梯,精辟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sup>[4]556</sup>并且给予一个重要的判断:“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sup>[5]</sup>

如果没有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没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机械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依次推进,那么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将会大大延后,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不会在20世纪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因此,这是涉及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

列宁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真正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问题,将这双重革命任务融为一体,从而大大推进了历史的进程。要完成双重革命的历史使命,其核心问题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列宁通过确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中,特别是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从而解决了这一核心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在民主革命中都要起领导作用。无产阶级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其核心问题就是领导农民阶级完成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历来都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现在必须说得更确切一些:这就是带领农民前进的领袖的作用。带领农民干什么呢?带领农民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sup>[6]</sup>。应该说,列宁解决了在一个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重大贡献,已经具有了探索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道路的意义。在论战中列宁已经清楚地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sup>[7]776</sup>列宁已经从俄国革命的特点进一步思考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他在《论我国革命》中将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进一步延展开来,认为:“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sup>[7]776</sup>并进一步得出论断:“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

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殊性。”<sup>[7]778</sup>这些论述后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对于毛泽东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列宁的这一重大贡献的认识,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这一角度展开的,并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民族特色的意义,甚至还力图避免从民族特色的意义上来解读,这从一开始苏联共产党中央阐述列宁的贡献、阐述列宁主义的内涵时就体现出来。

季诺维也夫在纪念列宁的《列宁主义》一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sup>[8]</sup>。从今天来看,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命题,如果按照这一维度展开,可能会深化对社会主义特色道路的认识。然而,斯大林坚决反对把列宁主义局限在俄国的范围内,而强调其国际性、普世性。他认为认识列宁主义必须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他批评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的观点,指出这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sup>[9]</sup>。在斯大林的话语体系中,把列宁主义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显然是贬低了列宁主义的价值,而越是强调其国际性和普世性,才越是能够体现出它的重要价值。产生这样的价值评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对社会主义运动属性和形式的认识,这一历史时期还依然是以统一性为主的。尽管俄国革命已经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色,列宁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重要论断,但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认识,包括列宁自己也是主要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还谈到,俄国革命是暂时走到了前列,依然热切地期盼着发达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尽快到来,“被事变进程暂时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前列的我国,现在正经受着开始分娩的特别厉害的痛苦。我们有一切根据来极其坚定地 and 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这个未来正在为我们准备新的同盟者,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更先进的国家里的新的胜利。”<sup>[10]556</sup>认为“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sup>[10]707</sup>,列宁把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坚持下去、避免失败



的必要条件,认为:“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sup>[10]580</sup>

布尔什维克即使取得了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这仅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时,并没有将其立足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其政权的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是世界性的而非民族性的。苏联在1924年的第二部宪法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概念,并且把苏联的成立“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结合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步骤”<sup>[11]</sup>。很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难以从民族特色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运动。

其二,对社会主义运动统一性的强调,客观上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传播。直到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范围主要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俄国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工业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走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列,而对于大多数落后国家来讲,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事物。以中国为例,19世纪末中国人才开始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将社会主义学说意译为“安民新学”、“人群主义”等。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的概念逐步得到确立和使用。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并不广泛,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才由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实际上,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在19世纪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作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领导和协调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核心,第三国际的成立,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这样的功能。召开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指出了建立第三国际的三个重要原因:由于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不断推出新课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和勾结;背叛了社会主义的政党沦为资产阶级的帮凶欺骗工人阶级。因此提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的国际性联合,指出:“当前的世界形势要求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相互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要求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彼此实行大联合。”<sup>[12]</sup>第三国际的成立推动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划清了

同社会民主党控制的第二国际的界线。到1922年,全世界已经有40多个共产党。如果没有世界性的联动,很难想象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很快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

### 三、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社会主义特色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展开的统一性特征和理论内涵,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历史性变化、其民族特点的显现和思想的奠基。统一性特征向民族性特征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逐步被各国共产党熟悉和掌握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国家国情的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来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比较重视思考如何立足中国国情来掌握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李大钊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分析中西文明的差异。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系统地分析了东西文明的差异,指出东西文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它们之间存在十四点差别:“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sup>[13]</sup>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期,还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在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的重心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特点。李泽厚先生在论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就认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这特色使他不同于陈独秀,而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倒有一脉相通之处”<sup>[14]</sup>。这一评论是比较中肯的。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sup>[15]</sup>从阶级斗争理论入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本身就开始体现出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国特色。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加注意到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瞿秋白在1927年12月的《武装暴动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中国革命在斗争形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并指出特点如“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是“各省农民此起彼落的武装暴动”，从而“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必需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和逐步“扩大”。<sup>[16]</sup>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瞿秋白已经极有见地地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该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游击战以及根据地建设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尽管还没有达到毛泽东后来认识的程度，但探索的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认识和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对农民革命的关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提出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指出：“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sup>[17]</sup>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探索，对于后来中国突破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以及将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实践的探索促进了理论的深化。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他首先提出了指导思想的本土化问题，即反对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来指导中国革命。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又称《调查工作》）一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首先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习惯于靠背马克思主义

本本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现象，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sup>[18]</sup><sup>111</sup>批评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化的倾向：“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sup>[18]</sup><sup>111</sup>毛泽东指出了载于本本的经典理论应该具有的地位和我们为之应该采取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sup>[18]</sup><sup>111-112</sup>

如果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从实践的层面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的规律、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提升。该文曾经遗失，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从福建省龙岩地区找到当年《调查工作》的石印单行本。1961年，毛泽东不仅仔细改正了文中的错别字，并将之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十分看重这篇文章，该文的失而复得，使毛泽东十分高兴，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sup>[19]</sup><sup>1146</sup>

毛泽东对《反对本本主义》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强调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要搞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sup>[19]</sup><sup>1146</sup>。毛泽东讲的迷信就是对本本的迷信、对教条的迷信。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对这种教条主义的迷信予以了更加犀利的批评：“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sup>[20]</sup><sup>820</sup>

毛泽东把反对本本主义同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结合起来，强调要弄清楚理论的来源和基础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sup>[19]</sup><sup>1147</sup>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再一次的飞跃问题，即创造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所以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来看,《反对本本主义》应该是奠基思想缘起的重要里程碑。这些探索和开拓,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更广的范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历史总进程密切相关。总体上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从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吸取先进的思想文化进而逐步改造中国的过程,而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就有一个使之如何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抵制、排斥和疑惑的阶段,尽管有林则徐这样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但总体上中外文化是相隔阂的。

第二阶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阶段,这一阶段有了很大的进步,肯定了西学的功能和有效性,大大加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持这一观点的改良派超越了保守派和顽固派,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但他们依然固守中国封建文化的本原。如薛福成认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郑观应论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即张之洞概括为“中体西用”之说。这一阶段不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这一段经验教训,中国也很难从根本上抛弃封建文化,走上寻找和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道路。

第三阶段是从西学东渐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使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真正开始翻天覆地变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进程:①外来的先进理论与中国国情和实践初步接触的阶段是认识论中科学理论回到实践中检验的过程。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决定着实践的成败,也决定着理论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问題,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态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②理论在运用与实践后进一步深化发展,产生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可以看作是第三阶段第二个进程的典型标志,因为它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在调查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促进理论的再升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就是在这—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吸收国外先进文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飞跃。

跃。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艾思奇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哲学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他在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论述到:“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sup>[21]387</sup>并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的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sup>[21]420</sup>胡绳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二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sup>[22]</sup>。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作了经典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sup>[23]</sup>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党中央的报告中鲜明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建设乃至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重大命题在当时由于苏联的原因没有公开、广泛地宣传,后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将这一表述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sup>[24]534</su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精神一直在主导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和探索,随之而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相同的精神实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是同实事求是的论述联系在一起的,他同时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sup>[24]522</sup>。在其后的



延安整风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两者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作风和态度,更清楚地展现了这两者的紧密联系:“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sup>[20]801</su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思想路线的提出和确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用,已经从了解、参悟并将之与实际结合,进入到根据新的实践深化理论、发展理论的又一个实践和认识的飞跃阶段。历史证明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新进程,也是中国革命道路开拓的新进程。毛泽东思想是这一新进程的思想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是这一新进程的社会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7.
- [4]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96.
- [6] 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56.
- [7]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M].郑异凡,郑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5.
- [9]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5-396.
- [10]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苏联宪法(1924年)[EB/OL]. [2015-05-08]. <http://www.docin.com/p-605980291.html>.
- [1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8.
- [13]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57-558.
- [1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55.
- [1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
- [16]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81-387.
- [17] 钟家栋,王世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50.
- [1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2] 胡绳.胡绳全书: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61.
- [2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周莉]